



广州中央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前身)组建的“中南第二批志愿医疗手术大队(广州队第二队)”

图片来源:广东省人民医院



抗美援朝期间广东社会各界志愿赴朝事迹考述

□ 周云

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抗美援朝战争是这么一段历史: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迫使美国在板门店同中朝代表签订停战协定。而实际上,抗美援朝战争除了朝鲜战场军事上的斗争外,还包括国内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党和政府很快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动群众,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广东人民全国人民一起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以各种形式支援抗美援朝。1950年11月5日,《南方日报》发表《为了新中国,必须抗美援朝!》的社论,呼吁“华南人民用各种志愿的方式来表示我们抗美援朝的决心”,面向广东发出了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广东社会各界根据朝鲜战场的需要,组织人员直接前往朝鲜,进行战地服务,陆续组织了志愿医疗队、志愿运输队、赴朝慰问团奔赴前线,与志愿军并肩作战,用无畏的精神、无私的付出写下了广东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篇章。

广东医药界组织志愿医疗队

在朝鲜战场激烈的战斗中,大量的志愿军战士负伤,朝鲜前线需要大量的医疗救护人员。抗美援朝战争伊始,毗邻朝鲜的东北地区就有民众志愿赶赴前线参与战地后勤、医疗救护等工作。不久,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相继组织医护人员参加的志愿医疗队、手术队等奔赴前线。广东也随之立即组织。

组织志愿赴朝医疗队的行动首先在广州展开。1950年12月3日,广州医务工作者召开会议,决定组织赴朝医疗队。经过筹备后,1951年1月4日,由黄榕增、蔡纪慎教授等14名来自中山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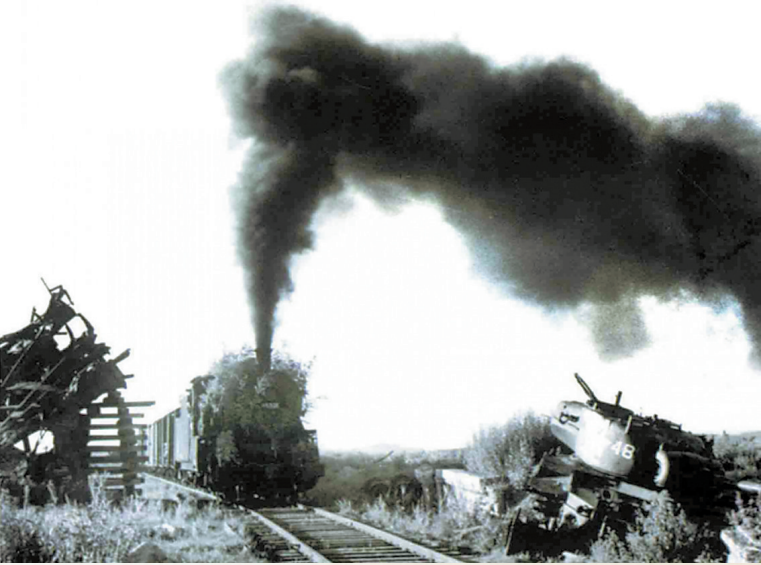
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医务工作者组成第一批志愿援朝手术队出发北上,奔赴朝鲜前线。临行前,广州医药界为手术队举行了热烈的欢送活动,手术队代表黄榕增教授在会上鼓励全市医疗工作者加紧组建预备医疗队,共同担负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责任。1月9日,广州医药界成立中南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广州分会,负责后续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及预备队的组织工作。到1月29日,广州分会正式决议组织赴朝志愿医疗预备队,随时待命出发。至此,广州医药界建立了志愿赴朝的组织机构,可以根据前线需要随时派遣医疗队。

此后,由于朝鲜前线医疗需求的增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红十字总会于1951年2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医疗队的通知》,号召各地医务工作者组成医疗队,赶赴前线参加为期三个月至半年的医疗和防疫工作。广东医药界热烈响应,立即组织报名踊跃参与,形成了医药界抗美援朝的新高潮。4月15日,广州再次派出一批医务工作者赴朝,其中不仅有手术队还有护士队。省内其他地区医药界也积极参与其中。10月23日,珠江、粤中两专区组成的混合援朝医疗手术队共53人北上赴朝。

同前线作战一样,组织志愿医疗队的行动一直持续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到1953年初,广东还组织了第三批医疗队(包括一队骨科队)前往朝鲜参加医疗卫生工作。截至1953年6月,广州参加志愿援朝手术医疗队的人员有146人,省内其他地区则先后有8批,共159人。

广东工人组织志愿运输队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运输能力一直受到严峻考验。战争初期,志愿军节节胜利,战线不断向南推进之际,后方运输能力面临的考验也愈发严峻。1951年1月,东北军区召开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提出要在朝鲜战场上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各地在



“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图片来源:钱桂林《图说铁道兵》,解放军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此次会议后增调运输人员赴朝,加强运输能力。

广东迅速行动起来。1951年3月2日和3日,第一批广州铁路工人志愿援朝工作队共21人,先后出发北上。7月7日,第二批广州铁路工人志愿援朝工作队共7人也动身赴朝。铁路工人毅然决然赴朝的同时,他们的家属纷纷以写决心书等形式表达了对亲人志愿援朝的支持。家属傅荣华说:“我的丈夫,这次用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我不但不阻挠他,还要激励他帮助朝鲜兄弟打败美国侵略军”。除了动员铁路工人,广东还动员汽车司机积极报名参加。1951年9月13日,广州抽调41名汽车司机积极分子,组成第一批广州抗美援朝志愿运输队出发赴朝。次日,由省内各运输公司选出的21名汽车司机组成广东省汽车司机援朝运输队亦启程北上。

志愿援朝运输队在美军的疯狂轰炸与严重破坏下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美军利用其空中优势,对朝鲜的交通要道进行狂轰滥炸,仅1951年11月,就出动飞机先后破坏桥梁1600座次、车站347处次、隧道89座次、机车1058台次、车辆8123辆次,使志愿军的交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这种艰难而危险的环境下,广东省志愿运输队服从上级指挥,配合铁道部队开展道路抢修与物资抢运工作。部分队员因表现优异,获得了朝鲜铁路管理局的表彰,薄云路获两次集体大功,郭尚智获一次集体大功,刘汉桥获一次集体小功,朱恩庭获一次集体小功,胡铿获一次个人小功。

汽车运输队在朝鲜战场,也非常勇敢地面对了生死考验。据运输队成员区镜池回忆,“联合国军”到处都设有运输封锁线,特别是在接近三八线的地方,他们称之为“生死线”。夜晚美军不停地投放照明弹,看到汽车就轰炸,非常危险,但是他们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有的汽车司机不幸牺牲,长眠于朝鲜大地,区镜池回忆说,“在我们广州40个司机中,牺牲的有8—10个,我疾的有几个,我就是其中一个。”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广东向朝鲜输送了大量的铁路和汽车工人。截至1953年6月,仅铁路工人广州就派出20多批共673名,省内其他地区则派出14批共454名,另组织了万人以上的赴朝工作预备队。

广东社会各界组织赴朝慰问团

中国人民志愿军远赴朝鲜,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国内父老乡亲们系志愿军将士,因此开展了慰问活动,让“最可爱的人”感受祖国同胞的关怀,了解家乡的巨大变化,以鼓舞军心,坚定战斗意志。

1951年1月25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组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分团会同总团前往朝鲜对前线指战员进行慰问工作。按照指示,广东从社会各界代表中选出10名组成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后因华侨代表较多,文艺界代表王力、妇女界代表厚颂文等三人因事经中南分团批准退出,华侨代表由丁波补上,文艺与妇女代表则空缺,故代表只有8人,记者2人,文工小组4人,共14人。由于工作需要,总团决定将原有地区分团混编为8个分团,广东代表被编入各分团进行慰问工作。进入朝鲜后,代表随各分团向中朝部队及朝鲜人民进行慰问、献旗、献礼,并将国内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及经济、国防建设等情况,向志愿军官兵作了报告,开过大小会议130次,参加人数共76428人,文工小组进行演出与慰问共37次。

1952年9月18日,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从北京出发,于10月上旬先后抵达朝鲜前线。广东亦派出代表参加此次慰问团活动,其中代表袁美厚还被选为第九分团副团长(第九分团依照总团安排未前往朝鲜,而是负责慰问安置在国内的伤病员)。11月上旬,总团和各分团相继回国。回国前夕志愿军领导机关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并保证:“今后做好工作,打好仗,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祖国人民的关怀。”

1953年9月23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召开扩大会议,“为慰问胜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英雄的朝鲜军民,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讨论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按总会计划,“本届慰问团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和工、农业劳动模范及解放军的代表,全团人数将达400多人”,是规模最为庞大的一届。广东立即举行推选会议,从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兄弟民族、人民解放军军以及烈军属、战斗英雄、工农业劳动模范、青年、妇女、工商界、宗教界和华侨等群体中选出了广东代表45人,广州市代表30人,共75人。广东代表被编为第五总分团第一分团,从1953年10月15日分开,对朝鲜人民进行了为期75天的慰问。

结语

可以看到,广东各界志愿赴朝,在各条战线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我们更要看到,这背后是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员,也是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感召,这个过程,也是新生人民政权得以巩固的过程。人们经常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在国际上打出了国威,为中国赢得了长久的和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抗美援朝运动以保家卫国为号召,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员,极大地提升了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也赢得了社会各界在思想情感上的高度认同,从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回望那段抗美援朝烽火连天的历史,广东人民以满腔热血,积极响应号召,谱写了一曲曲支援前线的壮歌。从医药界的志愿医疗队,以仁心仁术抚平战士的伤痛;到工人阶层的志愿运输队,在枪林弹雨中筑起坚不可摧的钢铁运输线;再到社会各界的赴朝慰问团,用深情厚谊温暖了异国他乡的英勇儿郎。广东儿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崇高使命,他们的身影在硝烟弥漫的朝鲜土地上闪耀,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场精神与意志的胜利,不仅显示志愿军的强大力量,更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伟力。广东人民赴朝支援行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是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感念先辈们的奉献和牺牲给我们带来的安宁和稳定。同时,从抗美援朝期间广东社会各界志愿赴朝的事迹也感受到,爱国主义也并不总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很多时候,也体现在普通人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每个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点点滴滴的奉献,最终会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磅礴江海,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这是战争年代的爱国主义与和平年代的爱国主义一脉相承的东西,是我们今天要格外珍重和传承的。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何以『天时、地利、人和』——广东南路人民支援海南岛战役的启示和意义

□ 窦春芳

1950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渡海作战兵团发起的海南岛战役,创造了由陆军乘坐木船突破国民党军队海、陆、空立体防线的奇迹,成功实现了敌前登陆,登岛后实施快速追歼,完全解放了海南岛。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渡海大作战胜利的战役。

海南岛战役的特殊之处在于陆海相隔的极端不利,给四野制造了作战的极端不利,突

破这种极端不利在四野乃至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并无先例,在海南岛战役发起之前,还有金门岛战役失败的惨痛教训。华南和广东党组织、政府将配合海南岛战役作为1950年的第一项任务来办;地处前线的广东南路,从西边的钦县、防城、北海,到东边的阳江、电白、茂名,特别是位于核心区的雷州半岛,给予渡海兵团强有力的支援,为渡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战前的不利因素

战场胜负虽有偶然因素,但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四野在海南岛战役中的战绩亦应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四野接到解放海南岛的任务时,这三方面的因素远远谈不上有利。

“天时”上,如果不能尽早解放海南岛,时间一长,岛上立足未稳的国民党守军不仅可以有更多时间部署防守,获得国际势力的支持,还对岛上的琼崖纵队构成严重威胁,一旦拖到了以东南季风为主的夏季,更缺乏利于以木帆船渡海的天条件,因此,天时上是不利的。“地利”上,南路虽然距离海南最近,但对于没有渡海工具的四野来说,不具备“地利”条件,成为解放海南岛的最大难题。“人和”上,参战的四十军和四十三军两个军都是四野头等

主力部队,中南地区解放后,四野的其他部队都转入了休整,他们却要打一场风险极大的渡海登陆战役,部分指战员一度产生过较大的思想混乱。部队大部分为北方人,不习水性,许多战士看到惊涛骇浪的大海和飞机、军舰产生恐惧心理,认为“渡海作战就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南路全境刚刚解放不久,大部分都是新区,国民党军逃离大陆时,把渔民的船或掠走,或烧毁,为的是不给解放军留下渡海的工具。渔民虽然藏下来一些船,但群众对解放军缺乏了解,还有土匪、特务造谣破坏,武装威胁群众,使得渔民不愿意轻易把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拿出来给解放军。南路财政窘困,民间穷苦,资源贫乏,这都是不利因素。

以上不利因素,在战前是

变不利为有利

“天时”上变不利为有利。作战兵团设计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强行登陆相结合”的具体作战方针并获中央军委认可。此部署可抓住有利天时,利用有利风向和潮汐实施数次小规模潜渡登陆,在大规模强渡前增加岛内我方力量。经过准备,1950年3月5日、10日、26日、31日,两个军的小股渡海先锋部队分四个批次成功实施“偷渡”,登陆海南。“偷渡”的日子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当地渔民师傅充当了“土天文台”,给出了在风向、潮水等方面有利的日期建议,帮助部队帆船顺风登陆海南。4月,随着夏天临近,有利的天气条件将逐渐减少,作战兵团根据当地政府和渔民提供的天气、风向、潮水等方面的情报,决定了大军强渡的日期。4月16日,2.5万多人乘500多艘船只在预定地点出发并登陆成功,在随后的战斗中摧毁了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精心构造的海、陆、空立体“伯陵防线”。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历史证明,海南岛战役时机的选择可谓恰到好处,天时上化不利为有利。

“地利”上变不利为有利。

琼州海峡天险难越,对练兵备战提出了极高要求,南路是大军练兵备战的理想之地,因为这里是距离海南岛最近的大陆。琼崖与隔海相望的雷州、高州、钦廉,当地通称广东“下四府”,语言、风俗有共通之处。长期进行干部交换、情报交流,两地党组织共享设于广州湾(今湛江市市区)的交通情报站。渡海部队进驻南路后,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迅速组织170多艘船、400多名船工,分批驶到雷州半岛,支援渡海作战。选派30多名富有经验的党政军干部潜回雷州半岛,向渡海部队详细汇报海南守敌的兵力部署和防务情况,介绍海南各港口、海岸线的水文、气象,为渡海提供可靠情报。为接应渡海部队,琼崖纵队和各级党组织还组织6万多人支前队伍,为渡海部队登陆接应、带路、翻译。南路还有更多的“地利”条件,特别是雷州半岛。首先,雷州半岛南北长约140公里,东西宽约60~70公里,面积0.78万余平方公里,以台地为主,次为海积平原,地面坡度一般仅3~5度,北部为和缓的坡塘地形,海拔25~50米。这种地形有利于快速修筑公路、发展交通以运送兵员、粮草和武器。半岛三面环海,港湾众多,树木林密,有利于部队和船只的隐蔽,使得驻军多达10万之众。半岛由于地形的关系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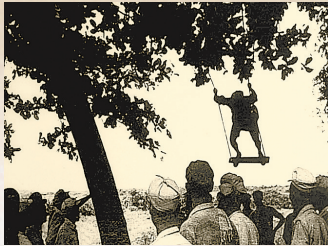
船工在帮助解放军进行登岛演练
图片来源: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年多风,东北风、西北风多集中在12月至次年三四月,有利于帆船往南直奔海南岛。雷州半岛东端的湛江市(第四十三军军部驻地)是南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粤西的经济重镇,财税、土特产集散地,粤西、桂东南等地的许多土特产都是通过湛江出口远销,商业较为兴旺,这对解放军的物资补给较为有利。湛江市的财政收入相对于其他地方也会高些,对于解决部队的租船、修船经费及其他开支也较为有利。

“人和”上变不利为有利。

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上是大陆败退过去的残部,士气低落。相对而言,虽然四野渡海部队缺乏渡海经验,但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对指战员们心理鼓舞巨大。部分指战员初时有过担心、害怕甚至抗拒的心理负担,针对上述思想状况,渡海兵团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作为战役准备工作的首要任务,开展了阶级教育与生死观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革命英雄主义;联系“李闯王”等历史上的一些惨痛教训,批判“半途而废”的思想,大大鼓舞了士气。南路群众一开始对于征船征工并积极甚至逃避抗拒。1950年2月初,南路支前司令部举行工作会议,号召各地采取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把军民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搞好,团结一致完成支援解放海南岛的任务。野战军各部也作出春节期间开展拥政爱民各项活动的指示。各地在春节期间普遍开展了军民互助、联欢活动。

随着支前工作的展开,群众顾虑打消,支前热情高涨。南路人民省吃俭用支援前线,修路修桥,捐粮捐物,共征集粮食大米355万市斤,稻谷1305万市斤,柴火2746万市斤,马草1237万市斤,还有汽车燃料



四野渡海作战兵团的战士们进行适应海上作战训练——荡秋千

图片来源: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客观存在的。但在中央军委和四野及作战兵团领导的正确决策部署下,在战役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下,在南路和海南人民的全力支援下,全体指战员通过主观努力变不利因素为有利条件,打赢了一场兼具“天时”“地利”“人和”因素的人民战争。

南路人民支援海南岛战役的伟大意义

南路人民支援海南岛战役,助力渡海作战胜利,参与了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歼灭了3万多名国民党军队,全部解放海南岛。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海南防线固若金汤”等国民党军制造的神话完全归于幻灭。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为巩固南疆、保卫大陆安全,保证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顺利推进创造了重要条件。

海南岛战役的胜利,有利

于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抗美援朝。海南岛战役结束一个多月之后,朝鲜战争爆发。参加解放海南的原第十五兵团主力之一的第四十军成为第一批入朝参战的4个军之一,第十五兵团的主要负责人及其领导机构,并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所,成为志愿军指挥机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海南岛战役的胜利,或在渡海作战被拖延,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实际上,海南和南路得益更为直接。首先,海南、南路及内陆安全得到保障,自此可放心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其次,通过实际支援渡海战役,海南、南路人民深刻体会到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无坚不摧的队伍,从而坚定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作者是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党史特别委托项目《广东南路军民对海南岛战役的支援与贡献》(GD19TW02-03)阶段性成果。

船工挺立船上等待出征命令
图片来源: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